第一章



刘易斯

（W. Arthur Lewis）

获奖年度 1979年

演讲日期 1984年9月27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生日期

1915年 1月 23 日

学　　历

1937年　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士

1940年　伦敦大学博士

经　　历

1938年—1948年　伦敦大学讲师

1948年—1958年　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教授（Stanley Jevon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年—1963年　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副校长

1963年一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麦迪逊客座教授（James Madiso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重要著作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

《经济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发展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 7 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 1932 年，我获得路易斯（St. 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语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

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士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在那后几年，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时，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个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

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 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 14 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 6 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 3 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 3 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3 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历。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强烈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到了英格兰，原来以为同样是 10 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冥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哪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士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尽管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有着分歧，但这些却无损于我们间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把我带入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课题，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 世纪 30 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不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对之却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 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 1937 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 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仍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垄断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确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

“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方面是时间的取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且波动的，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法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20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100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

（Labour 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 1947 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子，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 100 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 1948 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 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浏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 1936 与 1981 年的法国、 1945 年的英国以及 1976 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一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

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课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了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 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 1927 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因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 年—1939 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 Survey 1919 年—1939 年），汇集了我们当时对 1919 年—1939 年间世界经济的认识。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前为英国经济所建立的模型，已

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匮乏。我曾希望透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种经济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 20 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 30 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 20 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 20 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炭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uctural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unemployment），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0 年发生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0 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即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 20 年代后半期比 50 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 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 cycle 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 1929 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 1924 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 20 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 30 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 20 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需求增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平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

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收人的流通，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 20 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

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 30%。

以上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想藉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造成了 1929 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 年一1939 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

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1925 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场主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形势的措施倍加困难。

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是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业生产每增长 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增长 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 1873 年，并后推到 1973 年，但 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编印了回溯至 1870 年、甚至 1850 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 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 20 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

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我从 50 年代开始继续研究，直到 1978 年出版《1890 年—1913 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970—1913）这本书。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其中有 9 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

景气循环的历史轨迹

针对大恐慌究竟是否为单一事件的问题，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说法者认为，美国大概每 20 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大衰退。持肯定说法者则认为， 1929 年的经济大恐慌，其严重程度是先前历次衰退所不能比拟的。

几次重大经济衰退的年度分别是 1872 年、1892 年、1906 年及 1929 年（巧合的是，这一系列的衰退继续于 1956 年与 1973年发生）。这一连串的衰退是由顾志耐（Simon Kuznets）首先研究并加以界定，所以又称为“顾志耐衰退”。其后由于阿布拉摩维兹（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对此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个循环系源自营建业的长期循环周期，从景气的谷底开始，铁路建设积极展开，接下来是移民涌入，然后是兴

建住宅。经济在经历了 10 年的繁荣后，接下来会有 10 年的衰退，涵盖所谓的顾志耐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系列的景气循环会相继于 1956 年与 1973 年出现，实在出人意料，因为铁路的建造已告终止，同时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住宅建筑部门的规模都已大到一个程度，足以在整个经济中形成一个以 20 年为周期的景气循环。

20 年的循环就谈到这里。又有一派主张 50 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即在 25 年的相对创见，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着手撰写《成长与波动》一书的过程中，对此下过相当的功夫，但却没能在世界工业生产史中发现任何以 50 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农业生产在 1899 年倒是面临了一个转折点。 1873 年—1899 年间的农业产出的成长，远高于 1899 年—1920 年。1899 年以后，一路滑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扬。由于物价上涨，使得 1899 年之后的实际工资（Real wage）开始下降。1899 年之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农工产品之间相对贸易条件的改变。 1899 年之后的农业产出与价格呈现了此一改变的趋势，这一点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899 年之后，全球的工业生产是否有较快的成长，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1973 年以来，我们又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使康卓铁夫的学说再现生机，他的论述在欧洲正快速成长。这方面的论争，仍在持续地加温中。

再回到我个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研究产业结构；其次，我探讨 19 世纪中叶以后

的世界经济史；第三个部分则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研。我已经谈过前两个部分，现在则要谈谈经济发展的部分。

反对帝国主义

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个人反帝国主义的信念。我还记得 7 岁那年，家父曾带我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Marcus Garvey Association）的聚会。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Labour in the West Indies）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 30 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我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帝国主义的同志们，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我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 年，我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ice）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我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